

典范也是特例：历久弥新的中巴关系^{*}

张嘉妹

摘要：中国和巴基斯坦作为友好邻国，从历史文化到制度模式，二者间的相异性远远超过共同性。但是，当代民族国家成立后的战略需求，人文生活普遍核心的趋同性，让两个国家成为友好邻国的典范。时至今日，中国与巴基斯坦世代友好关系的建立与传承，不仅是地区战略需求及全球范围内的地缘政治所致，也是风雨历程中久经考验的政治互信的成果，更是地缘文化共通、互鉴的未来。中巴关系，已然成为异质文化邻国间关系的特例。

关键词：中巴关系 巴基斯坦 文化交流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位于南亚次大陆西北部，与伊朗、阿富汗、印度及中国接壤，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沿线国家，是中国的友好邻邦。中巴两国间的交流往来，自古有之。无论从带动了物质文化交流的丝路商队来看，还是从推动了精神文化交流的佛教传播来说，今天巴基斯坦所在的地域，正是南来北往、东西贯通的重要地理区域，是东西方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交流和传播的中枢地带，是与中国关系源远流长的“西天”圣地的一部分。

中国和巴基斯坦自1951年5月2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持续发展出睦邻友好、互利合作的关系。迄今为止，在70余年的风雨历程中，两国关系历久弥新，铿锵有力。作为有着563公里边界线的邻国，中国和巴基斯坦在地域面积、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学者个人项目“13至18世纪乌尔都语发展与南亚文化共变性研究”（批准号：21VJXG029）的成果之一。

人口体量、经济规模、政治制度、社会文化等领域，无一处具有共同性。但是，当代民族国家成立后的战略需求，人文生活普世核心的趋同性，让两个国家成为友好邻国的典范。

在世界格局变化和地区关系博弈中，中国与巴基斯坦关系的凝聚点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但是历经考验积累而成的互信互助和持续稳定的协商模式，成为两国共享的宝贵财富。在全球化信息科技时代的风云起伏中，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一方面拉大了两国实力间的差距，另一方面增强了巴基斯坦外交政策中的“中国主导”论。在新的历史时期，两国通过经济发展全面深化合作的模式，即“中巴经济走廊”等的建设，丰富了以战略需求为主导的关系导向。这一与时俱进的定位调整和协同发展的长远目标，既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趋势，也反映了两国战略合作的阶段性的发展调整。同时，也为两国民间交往、文化交流领域提出了新的课题。

一、中巴关系发展三阶段

1947年，英属印度脱离英殖民统治进入自治时期，分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独立的自治区域，进入当代民族国家的行列。以伊斯兰教立国的巴基斯坦成为穆斯林聚集的“圣洁的土地”。1950年，巴基斯坦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开始外交往来，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伊斯兰国家。1950年1月4日，巴基斯坦派出第一个高级官员代表团出访中国。1951年5月21日，中国和巴基斯坦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55年召开的万隆会议开启了两国亲近交往的实质性进程。在此后几十年的风雨历程中，两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长久保持了密切友好的关系。这一关系随着历史的推移日益强大，似乎打破了“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这一铁律。如今，两国关系已经发展成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且开始从政府层面的战略合作发展到民间的经贸与文化往来。巴基斯坦视中国为最亲密

的朋友和伙伴，中国将巴基斯坦当作“铁哥们儿”，两国相互尊重、信任、友好。两国高级别领导层定期互访，两国间的战略合作不断深化。

自建交至今，中巴关系经历了以下三个大阶段^①的起伏：

第一阶段，1950—1977年，有限的官方建交往来，以地缘政治为导向的战略调整阶段。两个国家都刚刚步入历史的新时期，都面临着国内外重重问题。在此期间，虽然1955年的万隆会议开启了两国交流对话的真诚往来，但巴基斯坦领导人的拥美立场、巴政府的频繁更替，及最终阿尤布·汗军管政府的上台，限制了双方的交往与距离。另外，在历次印巴冲突中美国的实用主义行为，将巴基斯坦推向了作为区域大国的中国一边，中巴开始在外交、经贸和军事领域携手互助：中国在克什米尔等争端中支持巴基斯坦的主权维护，巴基斯坦在国际事务中帮助中国缓解孤立的国际处境。

第二阶段，1978—2001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阶段，中巴关系从地缘战略主导进入多领域合作。一方面在经济发展的驱动下，中国与印度的关系开始逐渐回暖；另一方面中国与苏联关系的恶化及美苏间的地区竞争，让中国从区域大国进入了世界大国的角色中。虽然在此阶段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调仍然是内外兼修、韬光养晦，但是战略地位、经济发展速度以及综合国力的提升，已经将中国推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其间苏联的解体，让中美、巴美关系均进入新的调整期。虽然中印关系已逐步恢复正常化，但中巴关系再进一步深入发展，在多方领域建立紧密合作。

第三阶段，2001年至今，中巴关系体现出高度灵活的调整能力，全面合作开始逐步深化。发生在美国本土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使得全球进入反恐时代，巴基斯坦成为反恐战争的前线阵地，美巴关系进入目标指向明确的新阶段。来自美国的军事、经济援助再次让巴基斯

^① 综合参考了杜幼康、Ghulam Ali及巴基斯坦前驻华大使马苏德·汗等的观点。参见杜幼康主编《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中巴建交后两国关系的回顾与展望》，北京：时事出版社，2012年；Ghulam Ali, *China-Pakistan Relations: A Historical Analysis*, Karac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坦陷入被动的内外困境，中巴关系也在紧密合作中做出相应的调整。2013年，李克强总理出访巴基斯坦，双方达成建设“中巴经济走廊”的意向。2015年，习近平主席出访巴基斯坦，中巴双方签下51项合作协议和备忘录，15家中方公司参与签约，其中超过30项协议、备忘录与“中巴经济走廊”相关。此次访问不仅在中巴两国掀起了“中巴友谊”的新高潮，更成为亚洲乃至全世界瞩目的热点。由此，两国在多方领域的切实合作，将不断深化中巴关系的内涵，以期在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发挥积极作用。

二、世界格局中的中巴关系

中国和巴基斯坦最初在战略合作需求的驱动下，探索适合双方的合作模式，形成了保持高层密切对话、签署交流合作协议的官方交流模式。万隆会议后，两国高层往来逐渐增多。1956年，巴基斯坦总理侯赛因·沙希德·苏拉瓦迪访华，是巴方来华的首次高级别访问。同年12月，周恩来总理回访巴基斯坦。一年内两国总理的成功互访，极大地推动了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和两国人民友谊的发展。1961年，巴基斯坦在第十六届联合国大会表决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提案时投票赞成，强有力地两国关系向前推进了一步。1962年，两国通过友好谈判就中巴边界位置和走向达成原则协议。1963年，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外长访问中国。同年，两国通过和平谈判达成边界协议——《关于中国新疆和由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个地区相接壤的边界的协定》。随着中印关系的恶化，中巴关系逐渐升温、合作逐步深入。中巴两国边界从未出现过纷争冲突，为睦邻友好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1. 地缘政治主导下的现实选择

中巴彼此间信任的不断加强与合作的逐步紧密，是在大国博弈过程中地缘政治主导下的现实选择。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印边

境问题冲突升级，借此机会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积极拉拢印度，美巴关系降温。与美国结盟、加入西方资本主义阵营^①的巴基斯坦的地缘角色和分量在现实中遭受冷遇。美国在经济和军事上支持印度，寄希望于其在亚洲的崛起，以此去抗衡苏联与中国。相应地，美国开始削减对巴基斯坦的援助，并一反之前的姿态，不再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向巴基斯坦倾斜，而是站到了中立的位置。对此，即使巴基斯坦彼时的领导人是亲美派，也不得不从战略上考量与邻国中国的实际关系。美国在资金和武器上对印度的大力援助，让巴基斯坦国内的舆论一致认为：感受到了来自盟友的背叛。虽然巴基斯坦在名义上还是被美国实际控制的中央条约组织（前身为1955—1959年的巴格达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1977年解散，巴于1973年退出）的成员，但实际上已经不再履行结盟协议。由此，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巴基斯坦彻底认清地区形势，即与印度和苏联的关系在短期内不可能改善，开始寻求培养与其他邻国尤其是中国的良好关系。

对彼时的中国而言，与中印关系紧张并行的是中苏关系的破裂、美苏关系的缓和，及美国与苏联对印度的拉拢。1959年8月，中印边境冲突爆发，苏联不仅不支持中国，反而公然指责中国的行为。同年9月，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在大卫营非正式会谈，虽没有实质性成果诞生，但意义重大，打破了冷战阵营间的禁锢。地区形势的变化，将中国和巴基斯坦推到了一起。

由此，在20世纪中期国际形势和地缘政治的推动下，中国和巴基斯坦，两个文化迥异的国家，开启了携手共进之旅。1960年，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率团在联合国明确发出支持中国的声音，标志着中巴关系开启实质性合作伙伴模式。经过几年的漫长交流谈判，中国和巴基斯坦最终于1963年3月签订了边界协议，确定两国关系进入了无后顾之忧的稳定时期。

① 详情参见杨焰婵《南亚地缘政治历史演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68—170页。

2. 国际事务纷争中的相互支持

在国际事务中，巴基斯坦利用自身与英联邦国家和伊斯兰国家良好沟通的优势，积极帮助中国打破孤立的局面；1964年，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PIA）开通飞往上海的航班，打开了中国与世界互动的窗口。1965—1971年，巴基斯坦在历届联合国大会上作为提案国，一直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1972年，巴基斯坦促成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为中美官方接触铺平了道路，促使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1974年11月，中国民航“北京—卡拉奇—巴黎”航线开航。1978年，连接巴基斯坦北部山区和中国西部的喀喇昆仑公路正式开通，建立了中国与阿拉伯海间的通途。1982年8月，两国签署开放中巴交界红其拉甫山口的议定书。

在地区局势紧张的大国博弈中，中国给予了巴基斯坦坚定的支持与持久的安全感。20世纪60年代，在印巴关系对立、巴美关系不确定、苏印关系日趋紧密，以及美苏关系逐渐缓和的态势下，巴基斯坦外长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和总统阿尤布·汗公开表示巴基斯坦的领土安全背后有中国的支持。1964年，中巴双方签署协议，给予对方最惠国待遇。中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倾斜性支持巴基斯坦。1970年11月，巴基斯坦军管总统叶海亚·汗访华，与周恩来总理亲切会晤。在长时间的真诚交谈中，中方在克什米尔、恒河水分配、巴基斯坦主权完整等问题上支持巴方。巴方在恢复联合国席位、核政策等问题上继续支持中国。

尤为重要的是，叶海亚·汗总统在此次访华期间带来了来自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机密消息，为接下来的中美外交对话提供了契机。1965年起，中美双方都参与到越南战争的一线战场上，紧绷的关系让双方都认识到打破僵局的紧迫性。1971年7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访问亚洲多国，在巴基斯坦访问期间对外称病休养，实则乘坐巴航（PIA）来到了中国，秘密完成了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为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打好了前战，国际局势从此进入了新时期。同年8月

16日，在巴基斯坦的协调沟通下，中国和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签署协议，开启中伊两国建交之旅。1971年，印巴战争再度爆发，孟加拉国独立，总理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领导巴基斯坦调整了外交策略，逐渐与屡屡背信弃义的美国和西方阵营保持距离，与中国走得更近了。

3. 共创美好未来的深化合作

在20世纪最后10年中，一方面，开放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各国大都建立了友好往来的关系，在南亚与印度也逐渐恢复正常化邦交；另一方面，巴基斯坦政府更迭频繁，没有一届民选政府能够圆满完成任期。但这些都没有成为两国高层继续友好交流、密切往来的障碍。1996年12月，江泽民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决定建立面向21世纪的中巴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江主席还在巴发表了题为“世代睦邻友好，共创美好未来”的重要演讲，首次全面阐述中国的南亚政策。

进入21世纪，“9·11”恐怖袭击的发生，将全世界卷入了反恐的浪潮中，巴基斯坦成为反恐战争的前沿阵地，再次为“冷战”余孽买单。2001年12月和2002年2月，江泽民主席先后两次与穆沙拉夫总统通电话，双方就“9·11”事件后的国际形势交换了意见。在21世纪的中巴关系发展中，双方通过重要的区域合作、经贸合作等方式深入推进全面合作。

在21世纪世界格局的风云变化中，中巴两国一方面在多边关系的平衡中积极发挥各自的作用，另一方面着手深入巩固双边关系，共建合作项目紧密落实。2010年12月，温家宝总理访问巴基斯坦，双方签署了价值350亿美元的协议与备忘录，成为巴基斯坦史上与其他国家签署的额度最大协议。双方在“联合声明”中称，两国的双边关系不仅致力于满足两国的基本利益，而且惠及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中国承诺协助巴基斯坦遭受洪灾后的重建工作，向巴方提供4.1亿美元的贷款与资助。双方还在阿富汗问题、气候变化、食品与能源、联合国改革等方面达成共识。2011年5月，两国建交60周年之际，吉拉尼总理访华。由于“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刚刚在巴基斯坦境内被美军击毙，

巴基斯坦在全球反恐战争中的作用与角色受到了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的空前质疑。胡锦涛主席在与吉拉尼总理的会晤中，不仅呼吁国际社会应该肯定巴基斯坦在反恐战争中的努力与付出，而且应该尊重巴基斯坦的主权与领土完整。这帮助巴基斯坦缓解了来自国际舆论的压力，为其尴尬处境解了围。

2013年5月，李克强总理访问巴基斯坦，双边合作再进一步，拉开了“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序幕。在此次访问中，巴方再次强调了其外交政策的支柱仍然是中国。同年7月，谢里夫总理履职后的第一次出访，仍然是来到中国。双方就经济与科技合作、纺织行业培训、灾害管理及为在巴国境内消灭脊髓灰质炎提供设备等方面签订了协议。2018年，巴基斯坦从中国酒泉卫星中心发射遥感卫星-1号（PRSS-1），成为了“太空俱乐部”成员。2019年，巴基斯坦在伊斯兰堡举办“第三次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三边外长对话”，这是解决阿富汗危机的外交突破。2020年春季全球暴发新冠病毒疫情后，中国是向巴基斯坦提供抗疫援助最多的国家。

三、异质文化间的交流与互鉴

自1951年建交以来，中国和巴基斯坦在文化、教育、科技、经贸和国防等多领域逐步推进合作，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联系密切，就重要问题及时磋商，中国共产党还与巴基斯坦各宗教政党间建立了友好联系。在两国协商机制上，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存在多种协商机制。^①在国防合作上，两国保持高层军事交流、结构化的国防与安全谈判、联合军事演习、人员培训、联合国防生产和国防贸易等。在贸易上，中国是巴基斯坦最大的贸易伙伴和主要投资者，巴基斯坦是中国在南亚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在民间交流上，两国人文交流

^① 包括外长级战略对话，外交秘书/副部长级政治磋商；关于南亚、军备控制、反恐、人权、和平及海上问题的磋商和对话；边境管理咨询和领事事务等。

日益紧密，但是尚存诸多问题。在当下“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深入切实的合作中，人文交流尤显其重要性。

中国快速的经济的发展推进了中巴多方合作的进程，为地区和平、协同发展付出了持续努力。外交部部长王毅曾表示：“如果说‘一带一路’是一首惠及多个国家的交响乐的话，那么中巴经济走廊就是这首交响乐甜蜜的开场曲。”^①2013年5月，双方发表关于深化全面战略合作的联合声明，成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基础。两国签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于开展中巴经济走廊远景规划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中巴经济走廊”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旗舰项目。2018年，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构建新时期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之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进入第二阶段^②，重点是加快巴基斯坦社会经济发展。

1. 新时期文化交流的紧迫性

在新时期的切实合作中，文化交流前提下的彼此理解，是推进深入、长久合作的基石。不同于以往在地缘政治战略主导下的政治宣传、官方友好，新时期地区协同发展态势下的中巴两国，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为示范、为实验、为依托，步入了多领域切实合作的新阶段，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合作细节问题和更大范围的相互理解问题。“围绕中巴经济走廊关涉的政治利益之争、军方实力独大、过重经济负担、生态环境恶化、渔民生计堪忧等问题，巴广大中下层民众表现出一种无奈和迷茫。”^③虽然，中巴两国媒体、智库、高校等民间团体积极参与

① 王义桅：《专家详解中巴经济走廊的“一二三四五”》，中国一带一路网，2017年4月27日，<https://www.yidaiyilu.gov.cn/p/11859.html>（访问时间：2024年1月20日）。

② 2013—2018年为基础建设阶段，2019—2024年为工业、产业发展阶段，2025—2030年为全面完成阶段。一说：2013—2014年为走廊框架设计阶段，2015—2018年为早期收获阶段，2019—2030年为完成整个走廊项目阶段。又一说：2013—2020年是早期阶段，重点是能源、基础设施建设；2021—2025年是中期阶段，工业起飞；2025—2030年是长期阶段，重点在文化、金融、旅游、贸易、工商业、运输等领域。

③ 何美兰：《巴基斯坦人对中巴经济走廊若干认知的分析》，《南亚研究季刊》2017年第4期，第31页。

其中，但彼此达成广泛的共识与深入的理解需要时间周期和多维度工作的展开，任重而道远。在此前，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中巴文化交流，是以官方为主导推进的，主要服务于文化外交，尚未达到人文交流的程度。1965年3月，中巴两国政府代表在拉瓦尔品第签订了文化协定，并于该年第一次签署了年度文化交流执行计划。依据文化交流协议，同年9月，中国派出首批留学生，赴巴基斯坦卡拉奇学习乌尔都语。1965—1966年间，两国签署广播电讯协议，增进彼此的关注与了解，并向对方开放本国的港口，开通海上航线。

在新时代的发展中，囿于文化外交的中巴文化交流已不再能满足两国合作发展的需要。地区乃至全球发展格局的变化显示，西方话语体系中地缘政治主导下的地区合作与发展，通过用资本支配教育资源、媒体传播等方式多途径全方位掌控国际话语权，造成地区间、地区内的隔阂与冲突不断发生，为民众生活带来的消极影响远大于积极影响。在获取信息越来越便捷的当代，突出地缘文化的互通性与互懂性，是应对虚假信息、话语操纵的根本路径。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巴基斯坦《战斗报》和《每日新闻报》同时发表题为《中巴人民友谊万岁》的署名文章，在文章中表示，“我们要把两国人文交流更紧密联通起来，推动文明对话。两国应该把良好政治关系转化为人文交流的动力，打造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友好合作的样板。今年是中巴友好交流年，双方要精心组织、密切配合，办好系列庆祝活动。双方要扩大人员往来、语言培训、青年交流、地方友城、传媒和智库合作，让中巴友好扎根基层，让两国人民的心灵更加贴近”^①。次年，两国间签订“中巴文化走廊”合作谅解备忘录^②，“双方商定在文化遗产保护、传媒、互联网以及汉语言教学培训等方面进行合作”^③。

① 《习近平在巴基斯坦发表文章：中巴人民友谊万岁》，环球网，2015年4月19日，<https://mil.huanqiu.com/article/9CaKrnJK91N>（访问时间：2024年1月22日）。

② 2016年4月，由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和中巴经济走廊委员会在巴基斯坦签订。

③ 陈小萍：《中国与巴基斯坦人文交流研究》，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22年，第17页。

2. 扩大教育、传媒领域的交流

在教育资源方面，院校教育不仅是培养本国人才的基本途径，也是培养国际人才、促进国际交流，尤其是青年交流的必要途径。“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民心相通是其他‘四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的前提和基础，而教育合作与交流是实现民心相通的有利途径。中巴教育交流与合作不仅为经贸合作提供人才、智慧与科技等方面的广泛支持，而且有助于对巴基斯坦传播中国文化和政治价值观，增强巴基斯坦民众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促进跨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①正如清华大学教授李希光所言：“中国与各伊斯兰国家需要互设语言和文化学习项目，包括在孔子学院和伊斯兰国家名校设立中国语言文化系。中国有实力的大学应广泛接收伊斯兰国家的留学生，同时派中国的教师和学生去伊斯兰国家的名校教书或留学。有条件的中国大学要积极推动去伊斯兰国家进行文化游学的项目，沿着古丝绸之路和今天的‘一带一路’设置专门课程，组织在校大学生开展跨文化学习和研究。”^②

在媒体传播方面，新闻媒体是国际话语体系构建的基本途径。作为前殖民国家，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的精英更为熟悉英语语境下的思维模式与沟通表达方式。“自由世俗派控制下的媒体几乎完全服从于美国。例如，巴基斯坦现在有35个乌尔都语频道，这些频道曾是亲中国的，但现在已经发生了变化。80%的巴基斯坦乌尔都语频道接受美国的资金、广告和稿件支持。”^③如已故巴基斯坦宗教与国际政治学学者埃贾兹·阿克拉姆（Ejaz Akram）所言：“受到西方媒体对伊斯兰和中国双重妖魔化的影响，当今中国社会与伊斯兰社会之间的确存在着许多

① 参见祝东、高婉妮《教育合作交流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意义初探》，《一带一路报道》2019年第6期，第118—120页。转引自陈小萍《中国与巴基斯坦人文交流研究》，第41页。

② 李希光、〔巴基斯坦〕埃贾兹·阿克拉姆：《文明的互鉴——“一带一路”沿线伊斯兰智库、文化与媒体》，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第10页。

③ 同上书，第7页。

的误解。中国和伊斯兰国家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加强相互理解与认识的进程中，必须突破西方的视角和框架，在中国和伊斯兰自身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双方学者和记者应建立直接的联系和沟通。”^①

3. 重视地缘文化的共通性

在地缘文化的共通性上，地区间历史悠久的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不应被即时的利益纠缠所掩盖，地缘文化的深厚根基和互通互鉴也不应对地缘政治带来的纷争保持沉默。人文的交流与对思想的关注虽然不具有强烈的传播性，但是来自学界的观察与研究从来都是微言大义。埃贾兹·阿克拉姆曾言：“我遇到的大多数中国人都称自己是无神论者，但我发现他们的内心世界都属于儒家、道家或者佛家。中国人多专注，善于思考，有慈悲心，而中国人追求的真善美，正符合苏菲主义对‘伊赫桑’（至美）理想的追求。所有的文明都有包含一整套核心信仰的世界观，在此之上，建立了对文明的认同。围绕世界观和核心信仰，不同的文明建立了不同社会的哲学、经济和政治。最容易识别的是外在的政治层面，其次就是社会经济层面。在这些外表的内部，是指导我们思想的核心信念。中国几千年的古老文明和多样的精神传统形成了中国的核心信念。”^②阿克拉姆教授是一位纯粹的穆斯林，但并不影响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解，不妨碍他对人类核心精神共性的发现。在他眼中，中国“对未来发展很有耐心。中国的崛起不仅是和平崛起，更是耐心崛起。中国人的耐心来自哪里？作为一个穆斯林，我相信《古兰经》里的一句话，‘真主保佑那些有耐心的人’。以儒释道为主要思想的中华文明就包含了《古兰经》中这句话所表达的意思。那些号称无神论者的中国人充满了活力，那种活力和耐心来自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基本价值观上，伊斯兰教法价值观与中国传统价值观是相通的，比如，伊斯兰和儒家都讲求诚实、中正、礼貌、体贴、

① 李希光、〔巴基斯坦〕埃贾兹·阿克拉姆：《文明的互鉴——“一带一路”沿线伊斯兰智库、文化与媒体》，第12页。

② 同上书，第28页。

善良、和平、怜悯、真实、纯洁、耐心、风纪、透明、谦虚、社区、尊严”^①。

四、历久弥新的中巴关系

中国和巴基斯坦在建国之初，分别受困于各自内政外交中的种种难题，虽然国内国际形势起伏不定，但两国却维系了持续友好的关系。“二战”后全球民族国家的区域基本划定，新兴国家巴基斯坦与邻国印度关系紧张，与阿富汗在边境划分上无法达成共识，联合国拒不接受巴基斯坦进入国际社会。在与周边关系中，巴基斯坦急需一个友好邻国，在国际事务中，极力避免将第三国推向印度一方。在高山另一侧的新中国，成立之初内忧外患，百废待兴，无论是在经济建设还是国际关系建立上，都处于被动、被排挤的状态。彼时的中国急需与其他国家，尤其是邻国建立友好关系。即便如此，中国和巴基斯坦友好关系的建立，也不是权宜之计或实用主义驱动下的相互利用。虽然两国在1951年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在中国国内，《人民日报》对巴基斯坦的相关报道直到1953年才第一次出现。从这个细节也可以看出，两国初期的关系，既不热络张扬，也不急功近利。回溯20世纪60年代两国关系紧密之初，双方主要诉求集中体现在地区安全、改善各自的国际处境和战略合作等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国内变革和国际事件中，中巴两国真诚协作，在坎坷进程中建立了互信、互助的友好关系。

当国内发展、国际关系等因素发生变化时，中巴两国彼此信任，与时俱进调整合作方式。纵观20世纪70、80年代，两国高层互访频繁，合作密切。1978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外交政策也有了相应的调整，同南亚其他国家也加强了交流往来，但这并不影响中巴历经风

^① 李希光、〔巴基斯坦〕埃贾兹·阿克拉姆：《文明的互鉴——“一带一路”沿线伊斯兰智库、文化与媒体》，第29页。

雨的密切友好关系。但是，由于在经济政策上的调整，中国改变了以往对巴基斯坦无条件援助的方式，开始以优惠贷款取而代之。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中，巴基斯坦由于政府更迭频繁，经济改革缺失，与印度关系紧张，再加上美国的制裁，国内鲜有发展。同期，虽然中国和印度的关系有所缓和，但并没有以与巴基斯坦的紧密关系、传统友谊作为代价。

在国际事务及地区安全问题上，中巴两国坚持为正义发声，联合行动。20世纪70年代末，苏联对阿富汗战争爆发，在这场持续了十年的战争中，美、巴和沙特招募了大批穆斯林“圣战者”参战，为“冷战”结束后的“恐怖主义袭击”问题埋下了祸根。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遗留在南亚的武器兵力成为“恐怖主义”的温床，南亚本地民众是第一受害者。新世纪中国与周边国家积极开展多领域的深度合作，其中以“中巴经济走廊”为旗舰项目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在以地缘政治为主导的世界格局中开拓性的尝试，是“连接欧亚大陆（以新疆为核心）与印度洋，实现南北大平衡，实现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明的逻辑转移”^①。

总之，在中巴关系的构建中，两国通过双边关系的历史发展进程，以及外交往来中对相互外交政策的尊重遵守，在当代世界树立了友好国家间关系的典范，更成为异质文化邻国间关系的特例。通过与巴基斯坦互信友好关系的建立与延续，中国向周边国家乃至全世界诉说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高瞻远瞩、兼容并蓄、克己利人的大格局，并且间接传达出这样一个信息：再次强大起来的中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平构建者，而不是他者凭借自身经验想象中的威胁。如阿克拉姆教授所言：“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均强调‘和平’‘和为贵’，提倡与人为善，以邻为伴，以理服人，以德化人；二者处理差异的智慧都包括多

① 王义桅：《专家详解中巴经济走廊的“一二三四五”》，中国一带一路网，2017年4月27日，<https://www.yidaiyilu.gov.cn/p/11859.html>（访问时间：2024年1月20日）。

元共存、和而不同。中国和伊斯兰国家应该通过文明对话和包容互鉴，共同发掘亚洲民族文化传统中积极处世之道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反对国际上一切针对特定民族与宗教的歧视和偏见。”^①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70余年的协作发展与互信友谊，若可以为国家间合作带来启示，突破狭隘的即时利益抓取，未尝不是全人类的福祉。

① 李希光、〔巴基斯坦〕埃贾兹·阿克拉姆：《文明的互鉴——“一带一路”沿线伊斯兰智库、文化与媒体》，第34页。